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7.3

一年出版4期，以17種語言刊出

義大利社會學

Matteo Bortolini,
Riccardo Emilio Chesta,
Andrea Cossu,
Flaminio Squazzoni,
Aliakbar Akbaritabar,
Annalisa Murgia,
Barbara Poggio,
Massimiliano Vaira

全球時代的結束？

Martin Albrow

科索沃的殖民遺緒

Ibrahim Berisha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社會

Steve Matthewman,
Holly Thorpe,
Elizabeth Stanley,
Dylan Taylor,
Robert Webb

特輯

- > 紀念 ISHWAR MODI
- > 介紹土耳其編輯團隊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7卷 / 第3期 / 2017.9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全球社會學的挑戰

我回想我與 ISA 的因緣際會這十年來，對於以民族國家為主的社會學內容和形式感到很震驚。我們有國際的社會學，以 ISA 為代表，還有許多研究委員會、主題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然而，這些都有著國家或是地區的特徵。聚集社會學家在一起的通常是國族的因素而非全球的。我們有全球社會學，但是要有個全球的社會學社群是更難達成的，數位時代也是如此。許多我們面對的問題，像是難民、移民、氣候變遷、金融資本、高等教育的商品化等，都有全球的面向，而即使我們會研究這個面向然後拓展這方面的理論知識，要形成一個全球社會學社群是很有挑戰性的。這部份是因為文化和語言的多元導致；部份也是因為公民社會—社會學的立場—都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而要跨過高等教育也是很難的，因為其相當階層化，各國情況又不一致，雖然我必須要說的是，學科的不平等在國家理和國家之間是一樣很深的。的確，只要有的全球社群在，那這個社群就是由那些具有資源和移動力的人所組成的，也因此把他們和在地的資源分隔開來。

這期我們有兩個很不同的社會學發展故事。義大利社會學在歷史上被巴爾幹化，被教會、共產黨、社會黨所分據，也因為長期的南北分裂所導致。若義大利的政治學已經因為和法西斯主義有關而名聲掃地，那義大利社會學也被左翼激進的紅色旅的關係而不受歡迎。紐西蘭的社會學則和英國的社會政策傳統有關，並且和殖民遺緒對抗奮鬥，這個小島國懼怕著其強大的鄰居澳洲。

總之，全球化對社會學的影響被國家歷史和堡壘所中介了。國家在世界中的位置對於該國的社會學有著很大的影響。因此，Ibrahim Berisha 的訪談強調了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的被殖民經驗，Martin Albrow 的訪談則聚焦在英國的全球影響。

我們失去了一位對於整合國家和全球社會學的重要推手之一 Ishwar Modi。他是《全球對話》的印度翻譯和編輯，也是休閒研究國際化的重要學者。他將會被懷念，其計畫會被繼續下去。



義大利社會學家討論在義大利為社會學而奮鬥的故事。



Martin Albrow是著名的社會學家，描述自己邁向全球化研究的經歷。



Ibrahim Berisha描述在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的被殖民經驗。



奧特亞羅瓦社會學家討論各種社會學的介入。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副主編:
Gay Seidman.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ina Bastani, Mina Azizi, Vahid Lenjan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Masataka Eguchi, Izumi Ishida.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Adrianna Drozdowska, Łukasz Dulniak, Jan Frydrych, Krzysztof Gubański, Sara Herczyńska,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ę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Łukasz Żołądek.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ș,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Tatiana Cojocari, Andrei Crăciun,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Alexandra Isbășoiu, Rodica Liseanu, Anda-Olivia Marin,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Ion Daniel Popa.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nastasia Daur.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全球社會學的挑戰	2
---------------	---

> 義大利社會學

21世紀的義大利社會學 Matteo Bortolini, 義大利	4
--------------------------------------	---

葛蘭西：義大利熟悉的陌生人 Riccardo Emilio Chesta, 義大利	6
--	---

雙面的義大利社會學，1945-1965 Andrea Cossu, 義大利	8
--	---

國際化義大利的社會學，1970s-2010s Flaminio Squazzoni 和 Aliakbar Akbaritabar, 義大利	10
--	----

義大利社會學的性別偏見 Annalisa Murgia, 英國, Barbara Poggio, 義大利	12
---	----

被宰制的學科：義大利學術界中的社會學 Massimiliano Vaira, 義大利	14
---	----

> 世界各地的訪談

全球時代的結束？訪談Martin Albrow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和 Diana-Alexandra Dumitrescu, 羅馬尼亞	16
---	----

科索沃的殖民遺緒：訪談Ibrahim Berisha Labinot Kunushevc, 科索沃	19
--	----

>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社會學

Ōtautahi後災難時代的新政治 Steve Matthewman,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	22
---	----

後災難地理的創意運動 Holly Thorpe,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	24
--------------------------------------	----

無聲無息的虐待 Elizabeth Stanley,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	26
--	----

社運與學術 Dylan Taylor,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	28
---------------------------------	----

邁向原住民犯罪學 Robert Webb,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	30
-----------------------------------	----

> 紀念ISHWAR MODI (1940-2017)

醉心於休閒研究 Rajiv Gupta, 印度	32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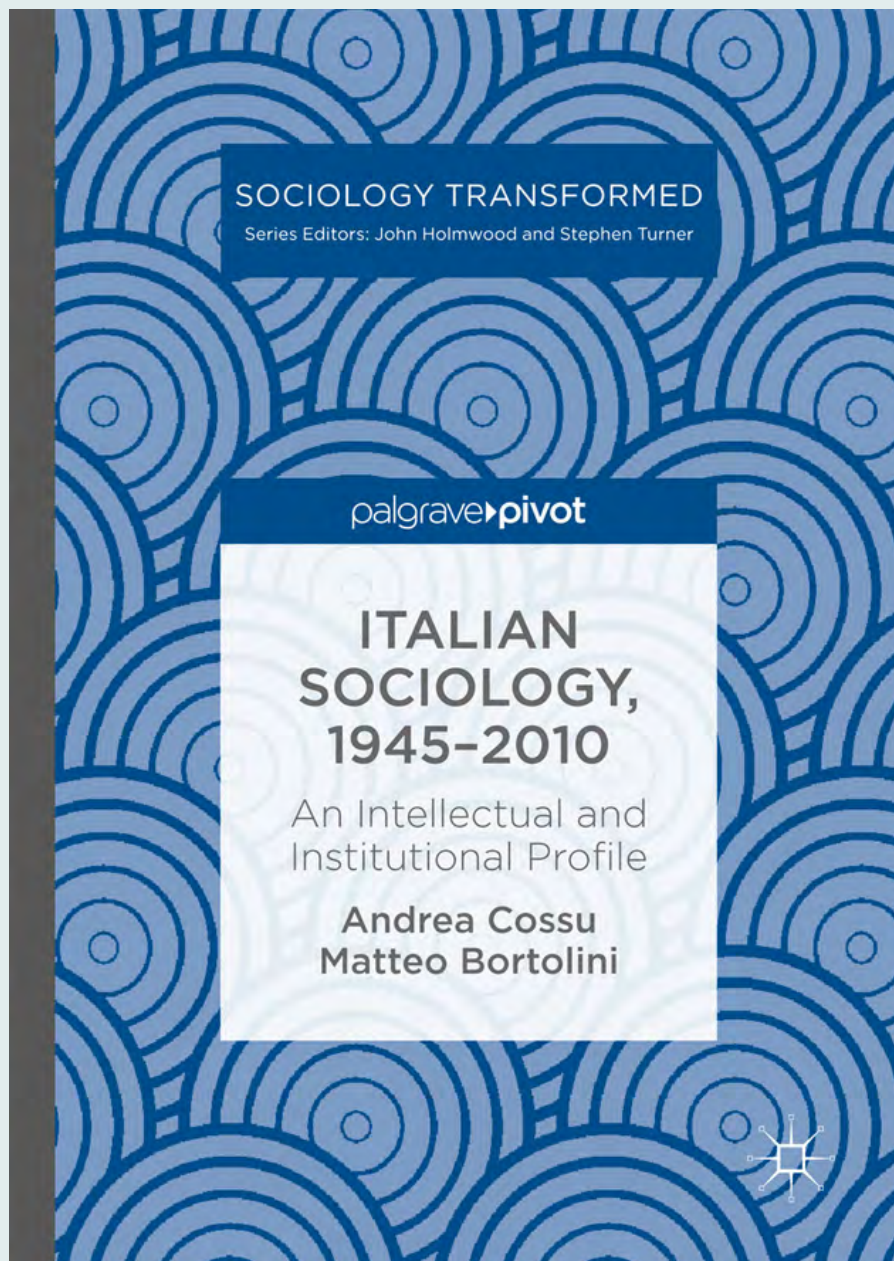
鼓舞啟發人心的源頭 Karl Spracklen, 英國	34
---------------------------------	----

> 特輯

介紹土耳其編輯團隊 Gül Çorbacioğlu和Irmak Evren, 土耳其	36
---	----

> 21世紀的義大利社會學

Matteo Bortolini, University of Padova, 義大利



剛出版的《Italian Sociology, 1945-2010》，作者為Andrea Cossu和Matteo Bortolini。

如同我和 Andrea Cossu 在《Italian Sociology 1945-2010: An Intellectual and Institutional Profile》一書中所論證的，1990 年代早期是英雄時代的結束，具有領袖魅力的社會學家比較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專業的社會學家，這以被稱為是一種「沒有標準的例行化」，社會學家對於議題、方法、理論沒有共識，這影響到的日常的學術實做，也影響了許多人，像是義大利或是外國的社會學家，全國性或是地方性的政治精英，社會和宗教運動，經濟行動者，大眾媒體。此外，這也防止了一種共享的社會學社群的視野的產生，沒有共享的專業或是倫理規範，沒有共同願景。社會學掙扎要去重建自己的現在，過去，未來。過去的「戰後社會學的重生」和「1968 年學生反叛」的神話對於年輕世代來說是很難理解的（見 Chesta 和 Cossu 的本期文章）。

可以確定的是，就像許多人發表在《全球對話》中的文章指出的，這個社會取徑與研究的多元化已經在過去 30 多年來在每個地方都進行中。在義大利，由於特殊的歷史讓這個後現代分化多了一點義大利的特殊味道。過去 15 年來，全球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轉向、管理和市場的意識形態、對於學術專業的戰後評量方法，三者已經削弱了義大利三個學術同時也是政治陣營 (com-

>>

ponenti)：羅馬天主教、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同時，年輕學者被鼓勵去拓展地理上、知識上、專業上的視野，許多社會學家到國外留學，或是做博士後，參加國際會議，成為全球學術網絡的一員。這造成的結果就是許多社會科學家放棄的義大利文作為主要的出版語言，遠離本土學界，讓義大利社會學越來越不可能可以達成實踐或是想像上的共識（見 Squazzoni 和 Akbaritabar 的本期文章）。

除了這些動態，義大利社會學主要面臨的三個挑戰：社會學在國家的文化和知識地圖中的位置，在社會科學以及新自由主義學術體制中的角色，以及其制度和組織的基礎。

一個義大利社會學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國家的社會想像（見 Vaira, Murgia 及 Poggio 本期的文章）。早期世代那些具有魅力的社會學家往往是有名的政治人物或是公共知識分子，但是晚期世代的社會學則影響力逐漸式微。一方面，義大利人對於從 1968 到 1970 年代的記憶就是社會學家是一群黨派分子和不可靠的知識分子（University of Trento 的校友加入了恐怖組織以及其他社會學家領導的新左派組織），這個看法現在還被逐漸強化。有些社會科學家被認為有強烈意識形態，「有機知識分子」，或是政治運動，工會、公民社會組織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從 1980 年代開始，社會學家被批評太過招搖，像是 tuttologi（什麼都懂的人）。雖然年輕世代的社會學家有許多是有名的知識分子，像是 Ivo Diamanti, Mauro Magatti, 和 Giovanni Semi（其 2015 年的書《Gentrification》引起

廣大迴響），但是社會學整體的形象重建還是需要時間和努力的。

學術社會學的命運仍然和義大利的高等教育體系緊密連結在一起。2004-05 年間，國家試圖要收集、分析、評估學術的生產成果。雖然那些結果有少數實際的影響，但是整體的圖像所呈現的是黯淡的，也就是義大利社會學是社會科學中最差的，所以社會學開始被迫要去改善以出版研究的品質。後來，新自由主義的 Berlusconi 政府引進了激進且爭議的義大利高等教育改革（law 240/2010），造成了學科間和學科內於 2012 年晚期高度整論此改革。ASN（國家的科學品質評量）所出版的結果中引進了一個新的聘用方式：只有 1/5 的人會晉升到副教授或是正教授的職位。此外，北義大利的大學則比中部和南部義大利的大學表現要好，所以比較多人可以升等。

結果關於區域和次領域不平等、三個學術陣營的權力、學科的分化的辯論可說相當激烈。其中一個最爭議的點是 law 2010 所規定的評量指標，這個指標不成比例地獎勵了研究型的學者。國外的出版品都會被獎勵，但是教學和服務則否。平均而言，跨國導向的社會學家在這個意義上勝過了其他在地導向的學者。

最後，對於 2010 改革的爭議對於義大利社會學會（AIS）有個很大且非預期的影響，AIS 在 1983 年成立，是一個給三個陣營去分配學術位置和研究資金的平台。該學會逐漸喪失了名聲和吸引力，ASN 的報告出爐之後讓許多社會學家退出該學會。因為會員數目創新低，所以學會想要強化自己

的公共角色和學科號召力。同時，經濟社會學家因為表現比較好，也拋棄的社會學會，自己成立了義大利經濟社會學會（SISEC），舉辦自己的會議，有 220 人報名，這是 1/10 的義大利社會學家的數目。時間會告訴我們這樣的雙重學會是否可行，或是這會上義大利社會學可以進入下一個歷史階段。■

來信寄給 Matteo Bortolini
<matteo.bortolini@unipd.it>

> 葛蘭西

義大利熟悉的陌生人

Riccardo Emilio Chesta,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iesole, 義大利



葛蘭西

在當代社會科學的辯論中，批判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是典型的像似物。事實上，他們的關係不是不證自明的。戰後義大利社會科學的重建完美地說明了對於社會的研究所進行的霸權鬥爭，也是一種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衝突。

我用霸權的概念不是剛好而已，因為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社會科學的模稜兩可的曖昧關係可以追溯到葛蘭西。從葛蘭西的哲學背景到其策略的對於知識分子的概念化，以及葛蘭西作品被義大利共黨的挪用，這些都造成了葛蘭西和義大利社會學之間的疏遠。相較於國際社群對於葛蘭西的接受度，葛蘭西在其本土故鄉義大利可說是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 葛蘭西馬克思主義的祕密唯心論

在其理論框架的建構中，葛蘭西遭遇了其時代的重要知識分子們，包括那不勒斯哲學家 Benedetto Croce，其理論和政治影響力在 20 世紀前期是很可觀的。事實上，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中最多引用的作者不是馬克思，也不是列寧，而是 Croce。

Croce 作為歷史唯心論的擁護者，拒絕了所謂的「社會科學」的存在，投入到了認識論的推論中，去證成法律的重要，拒斥社會學的可能。葛蘭西知道這個局限，特別是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歷史哲學的前提下，他還要求一種「反 Croce」的義大利文化運動，要克服唯心論和精神的霸權。同時，獄中札記和當時的社會科學有重要的對話，雖然是從批判的角度，但是某種程度上也承認了社會科學的嚴謹研究的重要性。

> Togliatti 的葛蘭西

為了要去了解 1950 年代的知識分子為何以及如何採用了一種祕密唯心的葛蘭西詮釋路線，我們不能簡單的把重點放在其著作而已。我們必須要去看葛蘭西著作的脈絡，主要是那些 1937 年身陷於法西斯囹圄之中的作品，像是獄中札記只有在死後才出版，並且是由葛蘭西的老友 Palmiro Togliatti 所收集的，他也是義大利共產黨的領導，其和共產黨的記者 Felice Platone 一起編輯該作品。第一版把葛蘭西的著作分成許多冊，包括 1948 年的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Benedetto Croce* 和 1949 年的 *Intellectuals, Il Risorgimento* 和 *Notes on Machiavelli*。Togliatti 和 Platone 把葛蘭西呈現為義大利文化傳統的傳人，重建一種理想知識份子的系譜學，包括了 De Sanctis, Spaventa, Labriola, Croce, 以及最後的葛蘭西。同時，一個清楚的文化霸權策略被一個特殊的「新馬基維利主義」所實踐了，使用了葛蘭西對於大眾政黨形成的分析，或是葛蘭西所謂的「現代王子」。

這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殊詮釋框架有個雙重目標。首先，葛蘭西被連結到 Croce 和

>>

歷史唯物論，正當化了共產黨的文化。第二，他的知識遺產必須要被轉型成為支持新馬基維利主義的歷史運動方向，Togliatti 是黨的領導，而黨則是帶領偉大工人階級航行前進的歷史舵手。透過這樣的整合，葛蘭西被詮釋成是一個代議民主的社會運動領袖。是一個進步布爾喬亞哲學家，而不是一個對於受壓迫者有興趣的學者，並且是一位歷史唯物論者，否定社會科學有任何的價值而言。

> 失落的環節

在 1950 年代，葛蘭西的作品變成了一整世代知識分子尋求開創一個左翼布爾喬亞的重要理論工具，並且批判新的社會科學為一種「資本家的工具」，主要從美國引進的，試圖要在意識形態的層次上去削弱工人階級。事實上，義大利的社會學主要支持者是一個企業家 Adriano Olivetti，其聚集和資助了技術專家和社會黨的知識分子。在他位於 Ivrea 的工廠，Olivetti 開啟了「社會關係部門」，其年輕學者或許研究有影響力的美國社會學研究，並且應用到工業關係之中。

共產黨知識分子和幹部領導仍然對於 Olivetti 的「共產黨企業」的計畫有所質疑，認為那是資本家防止階級衝突的一種技術官僚導向的方式。在一篇發表於 *Il Contemporaneo* 的官方期刊的文章中 (1955 年 9 月)，共產黨知識分子 Fabrizio Onofri 清算鬥爭 Olivetti 的文化的政治運動路線，認為那是彌賽亞主義，定調 Olivetti 為阿拉，把其右手的社會學家 Franco Ferrarotti 看成是 Olivetti 的先知穆罕默德。1950 年代的官方葛蘭西主義變成了歷史唯心哲學，建立在固定的理論預設上面，沒有經驗基礎，而只是 Togliatti 的「進步民主」的操作手冊，亦即要去在義大利民主制度下去贏得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

另外一個對於葛蘭西的詮釋開啟了新的批判左翼團體，稱之為義大利共產黨 (PCI)，這發生於兩起事件之後。第一是在 1955 年，FIAT 工廠 (工人階級運動的中心) 的工會內部選舉結果令人驚訝萬分，CGIL，也就是義大利主要左派的工會和 PCI 最強大的以工廠為基地的盟友，其得票少掉了一半。一年之後，蘇聯對於 Budapest 的抗議的鎮壓則激起了潛藏已久的怨

恨，機起了左翼知識分子內部的辯論，而許多知識分子則憤而脫黨。

然而，當年輕、熱情的知識分子 (包括 Raniero Panzieri 所領導的 Quaderni Rossi Raniero Panzieri) 開始挑戰在 50 年代被制度化的義大利馬克思主義。他們轉向了一種社會學研究的戰鬥模式，也就是 *inchiesta operaia* (工人階級的研究)，批判 Togliatti 對於葛蘭西的詮釋。但是這條路線並沒有真正對於葛蘭西有什麼新的發現，事實上，只有在 1967 年葛蘭西學院鼓勵社會學家去發掘葛蘭西的貢獻，但是那場對話並沒有真正開啟什麼學術研究。而且雖然 1968 年的反叛幫助了更新了批判社會學，引進了法蘭克福學派，多數的專業社會學家是閃避掉了批判理論的路線。1970 年代馬克思主義和巨觀社會學的衰落之後，葛蘭西似乎只是哲學史中的一個人物而已。

這邊有個弔詭：義大利的專業或是公共社會學不論在誕生或是鞏固時期都可以有遇到「真正的葛蘭西」。當世界其他地方，不管是美國、英國、拉美、印度，葛蘭西的理論都提供了重要的知識工具讓社會科學的文化研究、被壓迫人民的研究、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等，但是在義大利，葛蘭西的貢獻都被專業社會學家或是批判社會學家忽略，這讓葛蘭西成為了義大利最熟悉的陌生人哪。■

來信寄給 Riccardo Chesta
<riccardo.chesta@eui.eu>

> 雙面義大利社會學

1945-1965

Andrea Cossu, University of Trento, 義大利



Franco Ferrarotti是義大利專業社會學的創始者之一。

對科學來說，邁向知識接受和制度化的路徑是相當困難，包括了不只對邊界的辯論，也包括了複雜、有時候排他的基礎建設的開啟，並透過這樣的過程，希望該學門可以自立自強。戰後的義大利也不例外，特別是對社會科學而言。政治科學總是被認為是「法西斯」學科，統計學則有殖民幫凶的陰影，唯心論哲學當道，並且常批評社會科學，特別是針對其中最弱的社會學。

義大利社會學因此在一開始才像嬰兒在學習走路的時候就處在一個不好的環境中，不僅受到義大利共產黨有機知識分子的學術與政治的攻訐，也受到義大利大學制度的限制，這讓新生的學科很難發展起來。致命的從上而下國家官僚和地方父權的結合，這讓社會學家必須要在學院外發展這門學科。社會學家為社工建立了基礎設施，出版社，以及學校，雖然有時候處於從屬的地位，但是這個影響持續到了

1960 年代之後，而那時候起社會學家開始被學院接受。

義大利對於社會學制度化過程的反省通常圍繞在知識位置的歷史。如 Matteo Bortolini 和我在 *Italian Sociology 1945-2010* 中所論證的，我們必須要去發掘為什麼年輕的學者一通常被主流所邊緣化一會成為社會學家，並且後來加入了學術圈。這個世代的社會學家應該要被社會學般的檢視，包括了場域、關係、過程，因此要置換對於能動的和意識性的策

略的著重，因為那象徵了過去對於多數義大利學科的解釋。

在 1951 (當最重要之一的期刊 *Quaderni di Sociologia* 由 Franco Ferrarotti 和其指導老師哲學家 Nicola Abbagnano 一起設立) 和 1961 年間 (當時三的社會學派經歷國競爭之後而設立) 見證了社會學基礎建設的打造，以及義大利社會學的設立。回首過去，Diana Pinto 把這個時代分為兩個，若 1950-1956 是社會學的發現期，那後來則是「文化中心」，可是我認為「多重中心」可能是更好的比喻方式，

雖然大學是義大利知識界的核心，當 Balbo 與其同事認為社會學是一門「生病了的科學」、承認認為社會學家可以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因此讓社會學只是學院裡的替代學科。在那之前，社會學的基礎是在學院之外的，像是研究中心如 Centro Nazionale di Prevenzione e Difesa Sociale (Milan)，文化組織像是 Il Mulino in Bologna，以及政治運動像是 Comunità (由 Adriano Olivetti 建立，其特殊的創業觀點把社會學看成是在工廠內外培力社群的工具)。這些都建立了長期的聯絡，有著文化基礎和國際的組織 (像是 Ford Foundation 以及 UNESCO)，雖然有名的出版社像是 Einaudi, Comunità (Olivetti 建立) 和 Il Mulino 也都辯論社會學

如何和其他學科不一樣 (特別是哲學)。同時，學者的網絡也追求應用導向的社會學 (在 Milan, Genoa, Turin, Florence, 和 Portici)，像是工業關係，經濟社會學，社區研究，選舉研究等。

在 1950 年代尾聲，義大利社會學是個雙面的學科，在理論 (功能論導向) 和應用之間拉扯。「理論」通常意味著教條和偏狹的對於 Parsons, Merton, 和 Lazarsfeld 的詮釋；田野通常包括了標準的調查和基本的民族誌，沒有創新的空間。

儘管其狹窄的聚焦，社會學變成了「常態科學」，這是很必要的。第一代的社會學家 (包括 Ferrarotti, Alessandro Pizzorno, Sabino Acquaviva, Eugenio Pennati, Achille Ardigò, Luciano Cavalli, Giorgio Braga, Filippo Barbano，其地位是「libero docente」，這讓他們可以在大學裡教書) 用其專業和名聲建立了社會學的陣營。爾後其訓練了一批新的、更專攻的新生代學者，進入了義大利的大學系統，而社會科學也變得更加重要。

因此，在 1960 年代，社會學的地景改變地相當大。社會學要當義大利王子的導師的美夢已經枚了，取而代之是在學院內外有更穩定的地位，後來的社會學也在學院裡制度化了。第一個授予學位的大學成立於 1962 年的 Trento。社會系後來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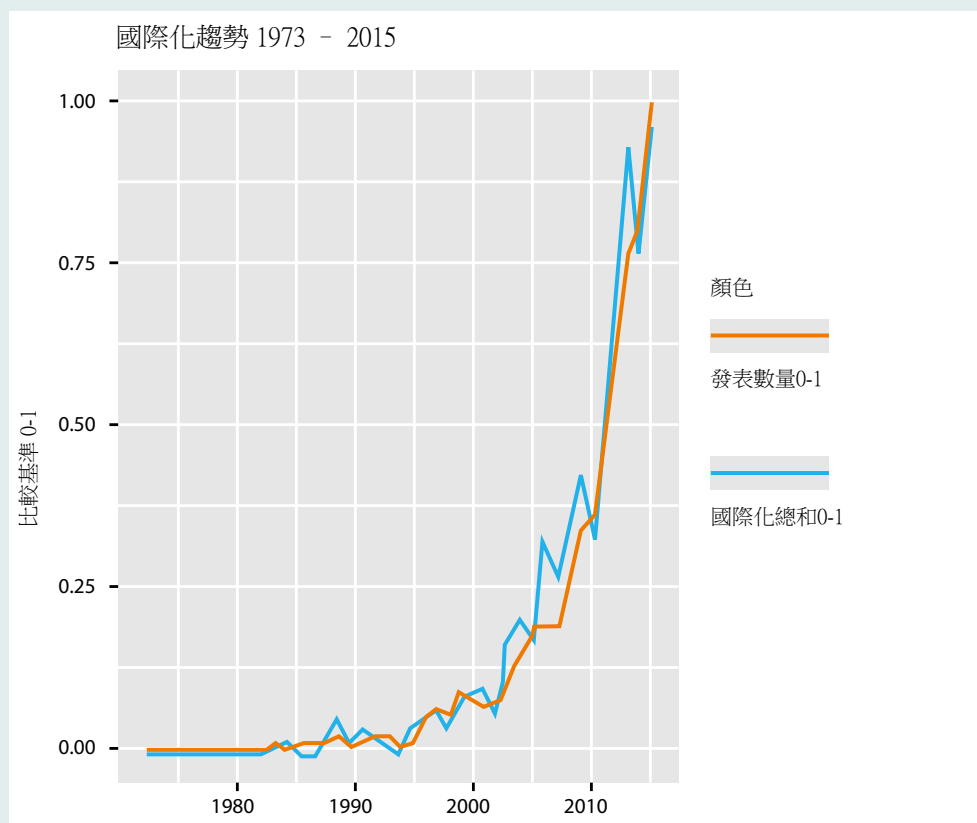
伴隨著政治系。

因此，20 多年過去了，一開始要正當化社會學的努力現在已經開花結果。長期來說，社會學的發展已經大多數被研究的需要所形塑，而非知識上的學術聲望所驅動。也不意外的是，長期在學術界之外的放逐也有著很大的影響，不僅形塑了社會學家的態度，還包括品味，以及理論導向。義大利社會學從 1960 年代晚期 (以及 1970 年代) 邁向了複雜的理論、經驗、方法道路。■

來信寄給 Andrea Cossu
<andrea.cossu@unitn.it>

> 國際化義大利的社會學 1970s-2010s

Flaminio Squazzoni 和 Aliakbar Akbaritabar, University of Brescia, 義大利



國際化義大利的社會學,
1970s-2010s

義大利社會學家分散在各個不同的教育和研究機構裡面。制度畫得聘用和升遷系統透過游上而下的管制、以及典範學校或是地區學校的衝突和共存，這讓社會學得以擴張到不同的系所裡面。例如，義大利的大學中，社會學的教職視差不多和經濟學數目一樣的（大學 1000 名正、副、助教授）。然而，當這個可能顯示了我們社群的成功演化，但是我們並不清楚這是否會帶來更好得研究，或是更差。

為了要去發展出一些量化的對於義大利社會學出版的分析，我們用了 MIUR（義大利大學與研究部）所有 1227 位義大利社會學家的名字（包括 2016 年開始的博士後），然後搜尋 Scopus 資料庫，該資料庫包括了國際期刊，會議手冊，書籍，章節等，還有義大利的頂及其刊，時間涵蓋了 1970 年代到 2010 年代。

我們發現了 63.8% 的義大利社會學家有至少一篇被 Scopus 收錄的期刊發表。這意謂著三個社會學家之中就有一位沒有在上述國際期刊、書籍章節、會議手冊、或是國內期刊發表過。

有一些義大利的社會學者的名字很常出現在資料庫之中。例如，五個人發表了超過 35 篇文章。另一方面，有大約 20% (249 人) 出版了一篇文章。若考慮到出版的影響，我們發現 52.4% (3515 人中的 1840 人) 並沒有被引用過。

有趣的是，該資料指出了地理上的差異。北部 (45.5%) 和中部 (27.2%) 的社會學家比南部的社會學家發表的要多得多，這說明了自我選擇的偏見或是負面脈絡的影響，或許反映了不平等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然而，只有透過進一步的大學聘用過程分析，其透過 MIUR 資料庫對於聘用委員會和候選人的重新調整，這

>>

樣才可以顯示出這樣的偏見是因為自我選擇和物以類聚的關係而非脈絡影響。

義大利的學術界或許不會驚訝於這樣發現，但是我們還有其他有趣的結果。實時性分析中我們考慮國際的出版合作關係，發現社會學家在國際上很活躍，也暴露在國際研究的標準之中。而在計算非義大利的合作者佔總合作數量的比例之後，我們發現國際合作的比例顯著地在這幾年增加，出版量也是。這些趨勢很類似，而國際合作的數量成長率過去十年超過了 50% (見圖)。

雖然進一步的分析需要去系統性的看導致的因素的影響，這個趨勢很可能是 ANVUR (義大利評量大學和研究的政府機構) 的正面結果，該機構成立於 2010 年，目的去評量 2004 年以來的研究。雖然社會學家花了些時間去調整發表策略，許多人原本對於國際期刊並不熟稔的也開始瞭解到了發表到知名期刊的重要性。此外，那些在國際上發表的社會學家或許已經決定去發表更多國際文章好把過去的投資獲得回饋。

我們並不想說這樣的制度壓力帶來了簡單的達爾文影響，也就是說科學家只是為了求生

存而做出調整。然而，對於資金的競爭的增加不論是在國際或是國家的層次

以及出版的家都可以增加國際化程度和在學術聲望。簡言之，我們可以說「Eppur si muove」--「這是有在動的！」■

來信寄給 Flaminio Squazzoni
<flaminio.squazzoni@unibs.it>

> 義大利社會學的性別偏見

Annalisa Murgia, 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英國, Barbara Poggio, University of Trento, 義大利



Trento學生運動，1968年。

義大利社會學和性別研究的關係相當複雜，由一系列的現象和事件所構成，並且象徵著義大利學術和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脈絡。

性別研究在1970年代進入了義大利的社會學辯論之中，這是由於幾位先驅的女性社會學家所導致。就像許多其他的國家一樣，理論對於性別的反思首先在學術界之外開始，並且特別是政治上的女性平權運動，圍繞著這個議題而展開的像是墮胎和離婚。但是這個緊密

>>



1968年女性主義運動的集會。

的和政治的連結也阻礙了性別研究在學術體系中的制度化，因為學科往往需要獨立於政治之外，所以性別研究一直需要和那些質疑其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傾向的控訴搏鬥。

但是義大利社會長期以來被標誌和看成為有著傳統性別秩序的社會，這清楚地反映在大學體系之中。廣泛的性別差異仍然可以在科學學科中看見，特別是長期以來的「剪刀效應」：女性的女學生和研究生多於男性，而且有更多的女性博士和博士後研究員，但是女性的教授比例卻非常少。在政治和社會科學中，2015年正教授女性只佔了26%，39%的副教授，46%的助教授（大學教育和研究部，2016）。很少的女性是期刊，特別是好期刊的編輯。

此外，義大利學術體制的嚴格結構提供了有限數量的官方課程，這也讓性別研究被邊緣化了，所以要引進新的學科是很困難的，特別若是沒有完全的正當性，如同性別研究，或是若是推動者只是年輕或是邊緣的教授，那則會更加困難。

同時，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的辯論也阻礙了性別研究進入學術場域。特別是在義大利有著非常重要角色的差異理論，其偏好自我意識和分離主義的宣稱，並且不信任大學，認為那是父權的堡壘。此外，如同Saraceno說的，義大利的女性主義學者之中那些想要在學院中發揮影響力的，長期以來在辯論的都是制度的策略，也就是應該引進特定的性別研究呢，還是應該要推動主流的性別研究觀點？而義大利大學體系的僵固性最終引進了女性研究，然後才是性別研究，後來有了規律的教學課程，提供學生課程與活動，也開設性別研究中心。

直到1980年代性別研究才開始爭取被完全地承認的地位，這個延續到了21世紀。社會學裡面重要的一步是2012年跨出去的，在義大

利社會學會內開啟了一個特別的分支。

過去幾十年來，義大利的性別研究已經逐漸擴張，但是這個擴張有點是分裂和非系統化的。今天，性別研究在義大利的學術社群之中仍然被侷限在特定的環境中。教學和研究的聲譽累積通常被連結到個別的女性學者，並且以她們在各自的大學中獲得的承認度為基礎。此外，給大學生和研究者的機會還是非常有限。一項調查顯示所有的學士和碩士的課程在2011-12年中只有57個課程著重在性別，非常少的比例。只有1/4的性別課程是在社會學底下開設的，而且沒有性別研究的學位被授予。研究所的性別研究課程也很有限，12個專門課程，6個碩士課程，4個博士課程。最近幾年甚至還倒退，是由於撙節政策和預算縮減，因為性別觀點仍然在追求學院內的承認地位。這個處境也被持續對於其政治偏見的控訴和廣泛的天主教會運動尋求拒絕性別研究的科學基礎所惡化。所有這些也都限縮的性別研究的擴張，讓其更加邊緣化。

儘管大量的產出和對許多社會科學有著重要的貢獻，性別研究今天在義大利還像是Di Cori所說的被看成是「認同的不確定」的狀態。甚至在社會學裡面，性別研究缺少了系統化和全面的正當性，而這個狀態將會在義大利持續下去。■

來信寄給 Annalisa Murgia <a.murgia@leeds.ac.uk>
和 Barbara Poggio <barbara.poggio@unitn.it>

> 被宰制的學科

義大利學術界中的社會學

Massimiliano Vaira, University of Pavia, 義大利

長期以來就爭論的所謂對於社會學的承認是一種科學學科的看法在義大利是一個新的事件。社會學作為晚期出現的學科，其承認度和制度化都不能說是完成的。結果就是現在的社會學處於一種被宰制的位置。從布迪厄的角度去分析，本文描述了 2000 年的社會學學科處境，使用官方資料包括了學術人員、課程、系所等說明社會學的邊緣化，被宰制的處境，並且其受限的權力是如何在義大利被呈現出來。

社會學可以被看成一種混合的學科，是一種處在純粹與應用研究之間的人文科學。對於理論、認識論、本體論的反省讓社會學更接近哲學，或是純粹理論，而社會學的經驗研究則生產了應用的知識，可應用到不同領域。雖然其他的學科像是經濟學、心理學、物理學等都有這種混合的特質，但是這些學科對於理論和應用的劃分都很顯著，有別於社會學的區隔。

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學處於一種瀕臨死亡的休克狀態。這種不完全的制度和混合特質讓社會學有著不確定的認同，仍然處於邊緣地位，和公共辯論不相關。

這個社會學的瀕死處境不論是在學術或是社會中都削弱的學科的權力。這透過全國性的資料就可以顯示社會學有多麼邊緣化。

首先，義大利所有大學（包括 97 所公立，私立，「虛擬」學校）900 個系所中，只有 5 個社會學系，這裡指的是那些以社會學為名的系所。而 2012 年裡，2687 名學生中只有 18 個社會學主修，由 16 所院校提供。2087 位研究生中只有 22 個社會學，由 18 所院校提供。2016 年則是 913 名博士中只有不到 10 個社會學博士。

這些資料相當清楚地顯示了該學科的邊緣位置。但是關於學術人員的資料一旦和其他學

科相比之後，更加明顯。該表格總結了 2000 年之後的比較。6 個比較的學科佔了學術人員總數的 60%，這是 2015 年的數據。資料顯示社會學有多麼邊緣化，而和更應用的學科相比，還有「純」學科和甚至是心理學這些比較相近的混合學科相比，邊緣化程度更加明顯。

作為一個學科場域，社會學因為一種雙重巴爾幹化的分裂而很積弱不振。第一，其分散在不同的系所，像是政治學、經濟學、法律、醫學、工程、建築、人文等，其扮演了一種輔助的次要角色，被其他學科宰制。雖然這有時對於其他學科也是如此，像是數學是經濟學、工程建築、醫學的部份，而心理學或法律是政治、社會、經濟科學的部份，但是這些學科比社會學還要有核心取向。例如，對比於義大利的 5 個社會學系，其他有 10 個藝術系，18 個心理系，12 個法律系，35 個數學系，56 個經濟系，137 個工程建築系（這位於一個特殊的 Polytechnics 制度領域中）。

同時，社會學也是內部分裂的，分成很多 componenti（派別）。有三大派別，但是不是建立在知識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政治立場上。這讓義大利社會學很難去形成一個整合的學科，很難有整合的方法去研究社會。

最後，社會學的學術社群從來沒有辦法開創一個信用累積的體系給專業社會學家。和醫學、法律、工程、建築、心理學、經濟學相反。這有雙重的影響。第一，這讓社會學處於專業市場上的不利位置，社會學的畢業生不被認為有專業技巧，也不被認為有專業知識，大家都會說社會學家什麼都知道也什麼都不知道。第二，社會學在學術中是弱者，社會學不宜稱去訓練「專業人員」讓這邊緣化更加鞏固。

這些結構和動態提供了至少一種印象式對

終身職教授的數目(以學科和年度劃分)

	工程和建築	藝術	經濟學和統計學	法律	數學	心理學	社會學
2001	6241	1769	3794	3957	2494	872	685
2005	8738	1867	4406	4612	2575	1086	817
2010	8608	1670	4647	4765	2443	1239	933
2015	7802	1382	4309	4328	2171	1238	906

處於學術邊緣的義大利社會學。

於社會學受宰制的理解。明顯地沒什麼科學、學術、社會經濟的資本，社會學在義大利被從三個學術端所移除，處於剩餘的位置，那就是科學承認端，學術權力端，經濟和社會承認的世俗端。社會學的資本匱乏於這三個面向已經說明了這個學科的機會有限，很難獲得象徵或是物質的資源。這樣的處境，是一個學科的制度歷史的產物，以及學術和社會不確定地位，還有「雙重巴爾幹化」，沒有專業名聲，這些都讓義大利社會學處於學術階層地位的底端，並被邊緣化。■

來信寄給 Massimiliano Vaira
<massimiliano.vaira@unipv.it>

> 全球時代的結束？

訪談 Martin Albrow



Martin Albrow.

Martin Albrow是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早期以韋伯學者的身份廣為人知，並且著有Bureaucracy (1970)一書。Albrow作為全球化的理論家寫作了一本先驅的作品：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1996)。其他著作還包括了Max Weber'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 (1990)和Do Organizations Have Feelings? (1997)。早期他拜師於 Norbert Elias門下，然後從University of Cambridge得到博士(1973)。他在世界各地教過書，也是英國社會學會會長(1985-7)以及ISA的期刊International Sociology的創刊主編(1984-90)。他是University of Wales的榮譽退休教授，也是英國社會科學院士。

本篇訪談是Albrow教授在羅馬尼亞的University of Bucharest給社會學和社工系的演講，由該校的社會科學研究院所組織(<http://icub.unibuc.ro/>)，訪談者是Raisa-Gabriela Zamfirescu和Diana-Alexandra Dumitrescu，都是該校社會系的博士生。

RGZ：你是全球化理論的先驅，這是怎麼開始的？

MA：事實上我接觸全球化理論是比較晚的事情了，我的社會學生涯是在我得到歷史學位之後的事情，因為我後來去了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讀了社會學，然後1961年開始教書，當時我正在寫關於韋伯的博士論文。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寫論文，因為我要教書，而我的興趣又很廣。我最後決定把重點放在組織，而我的第一本書是關於科層制，於1967年出版。

RGZ：而且被再版了8次。

MA：是的，那本書很成功，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只是一本小書，但是學生發現很有用，我也因此變得出名，還持續了好幾年。我發現我有個典型的學術生涯，成為教授，然後成為英國社會學會會長。這是在1980年代。我在編輯學會的期刊Sociology之後便得更出名，後來被邀請去編輯ISA的International Sociology。那是很大的轉變。那在1980年代中期發生，正值「全球化」變

>>

得重要的時候。當我急著完成我對韋伯的研究的時候，我問我自己「韋伯若活著，會做什麼呢？」我想他會研究這個世界史的新方向，他會對地緣政治感興趣，也會繼續其研究。他也是一個政治人物，也會對全球化感興趣。

所以，我在同年完成了我研究韋伯的書：1990年，那年我和我的助理 Elizabeth King 一起把一系列的文章收錄到一本書中：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 Reading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ology。其在 Madrid 的 ISA 世界大會出版，與會者可以得到一本，那時有 4000 多位社會學來自世界各地，這在我們的學科中開啟了全球化這個字。

RGZ：談到最近關於地域主義和全球化，特別是英國脫歐之後，你怎麼看歐盟的未來？

MA：我想歐盟的一個問題是其還沒有在世界其它地方發展出一個足夠強大的印象，其對於全球議題也還沒有足夠的說服論述能力。我想這是最弱的一點，但是當然啦在全球的層次上要有一個整合一致的架構是很難的，極度困難的。

脫歐我想你可以說對歐盟有兩個結果。第一是其可以讓歐盟更強壯，更整合，了解到其有弱點，也必須協調得更好才行。英國一定也是希望歐盟強壯，沒人希望歐盟變弱。所以大家都認為這是雙贏的，若是英國和歐盟同意，歐盟就會更強。另外一個可能就是有可能其他國家也會脫歐。的確有許多國家反歐盟，反全球化，反建制派運動。

RGZ：那麼申根政策呢？申根政策取消了歐盟之間人流動的邊界控制，但是在難民危機之後，這個政策被大加抨擊。

MA：當說到申根，我想我學到的是領導人常常是積弱不振的。「有些原則是不能談判的，不能妥協的」這種說法聽太多了。原則從來就不可能完全被實踐，總是有妥協。所以，例如人的自由移動在不同的國家是有不同的作法的，依賴於社會安全法律和居住法律。許多城鎮甚至有自己的居住法。自由移動這政策是可以在英國和歐盟之間談判的，而不是全有或是全無。另外一個錯誤是難民危機，Merkel 不應該說「讓所有人都來」。這在政治上很難被理解，而且會讓其他國家拒絕難民。

DAD：很多人談論社會媒體和社會運動，你怎麼看待數位化溝通的影響？

MA：年輕人是和數位化一起成長的，或許感覺到所有的運動是數位化所啟動的或是導因於數位化的。但是我必須提醒的是，在 1968 年有年輕人的運動，這遠早於數位化。此外，1960 年代也是一個反對文化盛行的年代，伴隨著大學裡的運動興起。有趣的是這在不同的國家中都自願性地發生，他們不必然有跨國的協調，因為他們反對都是類似的事情。

數位化的確有影響，其可以讓自願的領導型態產生，也不必然可以預期。以反全球化運動為例，在 1999 年的 Seattle 反 WTO 運動，上千人到的 Seattle，特別是加拿大來的。美國總統柯林頓本來要演講，但是因為抗議而取消了。傳統媒體給予了全球性的報導，那時沒有臉書，所以我想數位化的影響是誇大了。數位化的確讓溝通更有張力，也加快了回應的速度。政治人物知道這點，所以用社群媒體當作溝通管道。我們也發現傳統媒體像是報紙或是電視雖然正在式微，但是還是很重要，因為它們還是可以把人聚在一起，面對面，即使他們從不同的國家來。

數位化在其它領域有更大的影響，像是安全、監視、傳播等。政府得到的知識，祕密，駭客訊息等也更重要了，我知道任何的 email 都會被駭，只要想駭的話。

DAD：從一開始社會學家就把社會比喻成生物的有機體，並且這個比喻一直延續下來，你怎麼看？

MA：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演化。生物過程的變遷比社會變遷還要被理解得更多更好，這是因為我想像是繼承、認同形成、社會單元的形成等都是文化性的。人類文化的一個很大能力是個體可以從其出生的環境中解放出來，危險也來自人類好奇心，會發展出會滅人類的東西。我不是只是說炸彈這類的東西而已，我也指涉生物有機體，病毒等。不像生物演化的緩慢過程，機器人可以讓人類變得不必要，所以人類的知識造成了對人類最大的威脅。

RGZ：The Global Age 可能是你最著名的書了。你怎麼從你的論證角度看現今的政治動態？

MA：The Global Age 是在 90 年代中期寫的。我那時對於為什麼「全球」這個新語言變得那麼受歡迎感到很有興趣。我後來的結論是 1945 年的事件和 1970 年的事件呈現出了一種對於全球議題的新的承認，那就是一種

>>>

對於地球的挑戰。這和全球化是不同的，最狹隘的意義是美國推動其世界經濟的利益，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全球議題。在戰後的年代，最重要的議題是核子戰爭，環境威脅，貧窮的增加，海洋污染的。這些是不能在全球層次上解決的問題。對我來說，這就是為什麼全球的這個語言變得那麼重要的原因。

全球化在美國霸權的脈絡下變得政治化，特別是在 1989 年蘇聯瓦解之後。所以 The Global Age 一書主要是回應那些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單向的過程的人。全球時代是一個人類集體受到威脅的時代，現在，20 年過去了，怎麼了呢？我會說全球時代的政治症再結晶化，世界一分為二，一邊是啟蒙，全球化的，受教育的人可以從全球化得利，並且知道挑戰是什麼。這組人是領導也是反對派。然後在另外一邊了則是剩下的人。然後兩邊越來越疏離。

全球時代的政治已經變成跨國的了。所以不論發生什麼事情，在什麼國家發生，都會被看成的全球的。我想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了。所以，諷刺的是，當任何人看到和讀到荷蘭的可能政權轉移，或是厄瓜多發生的事情，這些變化只會在全球精英和再地人口之間的關係所能描述的語言脈絡下被理解。這就是全球的框架。我們沒有辦法不用這個框架去了解國家的政治。這是我的論點，我相信這論點被過去 20 年發生的事情所強化了，這個觀點下，我的確認為數位化的確有很大影響，因為人們會對網絡、連結、關係更有興趣。

DAD：回顧看你的生涯，有那三個主題你會希望你一開始就研究的？

MA：我是在一個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分野有強烈看法的教育體系中成長的，所以我很年輕的時候就放棄的自然科學，但是我現在了解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有很多是類似的，比我們想像得還類似。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對自然科學的基本問題有很好的掌握，像是辨識不同的力，以及我們用來描述它們的語言。所以第一我希望我對於科學有更多的理解。第二是我在學校的時候就對中國很感興趣，而我去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的時候我上了很好的研究中國的學者的課，而且我寫了關於中國的報告。後來我到了 1980 年代的時候我甚至

去了一趟中國呢。但是在我生涯中我從沒能學習中文。我現在可是開始在學了，不過我還是希望我 18 歲的時候就學中文，因為中文可是個徹底完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思考，不同的外貌，對世界不同的理解，我要是早點學習了中文，那可是多麼美好的一項人生的資產哪。

第三個是我相信我可以對宗教有更多的掌握，而且可以從中獲益。我在國教的家庭中長大，後來成了不可知論者。當我年紀大了以後我才開始了解宗教的世界觀有著很重要的洞見。當然，你在羅馬尼亞有著最好的宗教思想家 Mircea Eliade。我到了 50 歲前都沒有讀過他的書，我希望我在 20 歲的時候就念過他的書了。■

來信寄給 Martin Albrow <albrowm@hotmail.com>

Diana Dumitrescu <diana.dumitrescu@icub.unibuc.ro>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raisa.zamfirescu@gmail.com>

> 科索沃的殖民遺緒

訪談 Ibrahim Berisha



Ibrahim Berisha.

Ibrahim Berisha 出生於科索沃。他在 Prishtina 完成哲學和社會學的大學學位，然後到克羅埃西亞的 Zagreb 讀研究所，拿到傳播社會學的博士。其後來成為科索沃和國際的記者和編輯，現在則在 University of Prishtin 社會系教書。他出版了傳播社會學和社會文化的書籍，也出版散文和詩集。其最新的書是 *The Death of a Colony*。訪談者是 Labinot Kunushevc, 是 University of Prishtina 的社會學碩士。

LK：在你的 *The Death of a Colony* 一書中，你描述了科索沃的歷史是一個殖民地的歷史，這是什麼意思？

IB：第一，我想很重要的是每個殖民者都是不一樣的，被殖民者也不是鐵板一塊。但問題是在什麼樣的意義上是不一樣的呢？例如，殖民者會用不同的敘事去正當化其殖民，也有不同的殖民目的。例如，法國對於阿爾吉利亞的殖民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以及比利時對剛果的殖

民是不一樣的。

塞爾維亞在科索沃的殖民是從神話開始的，後來擴張到政治、經濟等領域。歐洲的殖民者並不以神話建構為基礎進行殖民，也不建構特定歷史事件的詮釋。而塞爾維亞在科索沃則是以 1389 年的科索沃戰役為神話殖民的基礎，認為那是「正確的歷史」。

LK：你可以多說一些關於塞爾維亞對於科索沃

的殖民目的嗎？相較於其他殖民史？

IB：殖民的目的和過程都不一樣。英帝國沒有試圖要剷除印度的本土人口，但是塞爾維亞政府有，其試圖要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進行種族清洗，而整個殖民侵略的意識形態基礎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阿爾巴尼亞人必須永遠在科索沃的土地上消失，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達成。這樣企圖發生了好幾次了，最慘烈的一次是在 1998-1999 的科索沃戰爭。而這不僅僅有塞爾維亞政府發動和參與其中，還包括了宗教、文化、學術、藝術領域的參與。簡單說，從法國人的角度，阿爾吉利亞就是多數住著阿爾吉利亞人，法國人終究會離開，但是科索沃被塞爾維亞政府看成是暫時的阿爾巴尼亞人居住地，是阿爾巴尼亞人要離開，讓給塞爾維亞人。

LK：你認為殖民策略的制定是以國家建構計畫為依據，或是被殖民者所主導？

IB：殖民的策略通常是有實質的影響的。在科索沃，這個影響就是社會人口的變化。在塞爾維亞人於 20 世紀後開始移入科索沃之後，都市、鄉村、建築等都產生了改變。對於中古世紀歷史的復甦和重構形塑了這些的變化，然後建造了新的村莊，城鎮，學校，道路，經濟基礎。人口的組成也可以輕易的被改變，因為整個塞爾維亞政府都已經佈署在那邊了，包括了軍隊，憲兵，法官，甚至政治人物。阿爾巴尼亞人的財產被合法充公，並且以農業改革的名義交到了殖民者的手上。

在最晚一次於共產黨統治時期的農業改革，村莊的家庭只能持有 10 畝的土地和森林，這對家庭的經濟來說影響很大。1950 年代，超過 60 人的農業家庭只能持有 10 畝的土地。這就是經濟遷徙的開端。年輕人寧願到 Belgrade 或其他南斯拉夫的城市去找工作。而煉金師，麵包師，鏢子師，手工藝師等以離開了。他們離開科索沃是因為那裡沒有市場。但是他們沒有切斷和家鄉的聯繫，還是會匯款回去。

相反的是，當殖民者進行佔領的時候，他們是擁有從母國政府來的大量財務資源的。那這樣的社會人口的變遷到底是怎樣呢？1912 年塞爾維亞人佔了科索沃人口的 1/5，到了 1939 年這個數字成長到 40%。殖民也不僅改變了人口結構，還包括了經濟、社會、文化的改變。村莊、非都市地區的種族隔離讓阿爾巴尼亞人無法分享到社會經濟變遷的果實。好幾年來阿爾巴尼亞人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例如關於阿爾巴尼亞的大學課程要到 1970 年才開設），他們在失去了財產之後變得相當貧窮，並且被隔離。在所有從南斯拉夫來的民族之中，阿爾巴尼亞人是唯一不講斯拉夫語的，這也是另外一種隔離。

LK：很常會聽到人說，在共產黨時期 Tito 的統治下，阿爾巴尼亞的政治和經濟比較好，這是真的嗎？

IB：在 Belgrade 政府不同意阿爾巴尼亞人成為平等的一員，不給阿爾巴尼亞人那些塞爾維亞人所享有的權利。在 Tito 的統治時期，特別是 1966 年之後，可以說是一種沒有真正改革的表面變化。阿爾巴尼亞人是南斯拉夫第三大的族群，僅次於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但是南斯拉夫政府有意識地去做出該扁。50 年代有大約 200,000 阿人從科索沃遷徙出去，逃避政府迫害，並且造成了大量的民族認同變化：南斯拉夫的「土耳其人」增加了 260%，從 1953 年的 97,945 人增加到 1961 年的 259,536 人，主要是阿爾巴尼亞人為了保護自己而做出的認同改變。

在 Tito 統治時期，殖民更進一步。科索沃擁有大量的鉛、鋅、銀、銅、鎂等金屬礦產，但是這些產出都被送到塞爾維亞的 Vojvodina 或其他地方加工，所以科索沃其實是發展落後的。

LK：阿爾巴尼亞的社會學怎麼看待塞爾維亞的對於科索沃進行的政治、族群、文化宰制？

IB：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社會學仍然很年輕，而且長期被教條主義所控制。Prishtina 大學的社會和哲學系於 1971 年建立，最知名的社會學家 Fehmi Agani 教授寫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Studies，他在 1999 年在科索沃戰爭的時候被處決了。Ukshin Hoti 是另外一位從 Prishtina 來的社會學家，90 年代的時候被逮捕，罪名是鼓勵言論自由。他在 1999 年被列為失蹤人口。Hoti 教授是在美國求學的，研究政治社會學。

今天，一群年輕的社會學家拓展了社會學的議題，包括了文化、社會結構、宗教、性別平等、傳播、政治等。他們帶進了新的方法，問新的問題。這是進步的象徵，也就是說他們不再透過意識形態的框架去從事社會學研究，因為意識形態是特定的政治宣傳，阻礙了社會學批判的思考。

LK：那殖民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

IB：今天我們可以談後殖民和後社會主義，因為經過了最慘淡的階段之後，科索沃社會正在重建，要把自己整合到國際的財金、政治、文化體系之中。然而，這樣的整合雖然看似充滿希望，但是沒有給人民帶來好處。失望、遷徙自由的限制、年輕人失業等讓人想起了過去的殖民歧視遺產和發展落後的歷史。

現在政策無法提供社會平等的失敗讓年輕人變得犬儒。多數年輕人想要離開科索沃，想要投入全球的就業市場，尋求機會，但是讓年輕人

在全球市場上找到工作去需要對教育體系做出改變的。

來信寄給 Ibrahim Berisha <iberisha5@hotmail.com> 和
Labinot Kunushevcı <labinotkunashevci@gmail.com>

LK：神話、榮耀、教條、政治宣傳等如何影響了科索沃社會？而這如何導致了阿爾巴尼亞人的從屬性？而阿爾巴尼亞人有辦法去抗拒這樣的宰制嗎？

IB：巴爾幹半島是個充滿虛幻的花園。誰是這些「榮耀記憶」的傳承者呢？知識分子，藝術家，半調子的政治人物。他們使用虛假的詞藻去安撫大眾，像是家園，民族，英雄，神話事蹟等。他們的語言充滿了愛家愛國這類的字眼，伴隨驕傲和威脅的語氣。他們是政客追求權力的工具。許多人一直召喚這些神話，為的是去騙那些失業和落魄人口，鼓動他們的情緒。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教條洗腦充滿各個角落。過去 5 年許多年輕人加入了 ISIS，到敘利亞和伊拉克，因為那填補了政治上的某個空缺，吸引了那些失望的年輕人。

LK：南斯拉夫的脈絡在今天科索沃的政治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IB：南斯拉夫現在已經是歷史了。那是在文化政治運動中因為地理相近性、語言、民族相似性而開創出來的東西，它不能存續的原因是因為其建立的基礎不是平等主義。阿爾巴尼亞人受害最深，所以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政治中並沒有容身之處。■

> Ōtautahi後災難 時代的新政治

Steve Matthewman,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奧特亞羅亞社會學會會長



天主教堂廣場，Ōtautahi (Christchurch) 2011
大地震後。

快速的都市化面對著前
所謂有的貧富差距，
全球暖化，大量絕種，
因此，如何永續兼顧平等是有
世界史的重要性的。世界上多
數的人口住在都市，2050 年將
會有 2/3 的人口會住在都市裡
面，並且日漸不平等。如同聯
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所警告的：
「全球不平等的增加，災難的
增加，都市化和自然資源以及
能源的消耗，這些都是威脅，
讓風險上升到不可預測、
全球的等級。」

都市因為能源使用者不成
比例的多，所以永續能源的發
展的關鍵還是在都市。都市目

前使用了全球能源的 3/4，若
是都市化繼續下去，2030 年之
前世界各國會投資 90 兆的資
金到都市、土地使用、能源基
礎建設中。光是能源基礎建設
而言，國際能源署使用了 16
兆美金去做這件事情，並認為
電力「將會佔這項投資的多
數。」有能源和有權利使用能
源基礎建設將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

奧特亞羅亞紐西蘭是世界
上最都市化的國家，從 1980
年開始其就見證了全球經濟不
平等的最惡化的階段。我們最
近開啟了一個 3 年期的研究，
注重在能源基礎建設以及一個
後災難都市 Ōtautahi (Christch-
urch) 的電力。

一般說來，要去完全地重

建一座城市是不可能的，但是
2010 和 2011 的 Canterbury 地震
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去建立
永續和平等的新城市，去建構
一個包容和韌性的電力能源系
統，使可以抵禦未來事件的衝
擊和破壞，像是自然災害，人
口成長，氣候變遷。

我們把 Christchurch 視為
是一個世界級的實驗室，意
思是，以往的研究者著重在大
都會，但是世界上多數的城市
是 50 萬以下的人口，而且像
是 Christchurch，城市必須要
面對處理氣候變遷和海平面上
升。「Christchurch 就像其他
的現代城市一樣，會受到自然
的威脅，但是該地震所帶來的
影響是全面的，所以此城市已
經變成了國際級的實驗場，讓

我們知道怎麼期待和希望未來的城市面貌，因為這是一座臨海並與海平面幾乎等高的小城市。」

計畫一開始是很有希望的，沒有類似的城市接受到那麼多的資源過。Christchurch 市第一個紐西蘭的城市之中發展出即時資源使用數據的，也是少數幾個最早參加「未來城市先導計畫」的成員，該計畫是一個目的在改善城市生活的論壇。還有，其也被洛克斐勒基金會報導是 100 大具有韌性的城市之一。

然而雖然地震提供了從零開始的機會，但是商業模式還是相當普遍。電力仍然由水力產生，並且被少數幾個私人公司所壟斷，然後沒有太陽發電的設施，消費者的分散發電網絡也很少，而且雖然紐西蘭有很好的風力資源，但是卻派不上用場。

這樣被浪費的機會是很可惜的。20 世紀中葉奧特亞羅瓦紐西蘭的電力全部來自水力發電，加上另一種再生能源：地熱能。然而，今天石化燃料佔了國家電力的三分之一，如同 Benjamin Sovacool 和 Charmaine Watts 所說的：「紐西蘭電力部門在某種意義上是很特別的，因為隨著時間的過去，居然再生能源的比例越來越少。」

理論上，轉型到 100% 的再生能源供給不應該有困難。再生能源的好處毫無疑問，其減少負面的消耗像是空氣污染，而且更可預測和穩定，較少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消耗較少的水，更有效率，還提供在地工作機會和收入。總之，再生能源比永續，更經濟，更具有韌性。

實際上，轉型到 100% 的再生能源體系不應該是困難的，而且照今天科技的標準是完全可行。奧特亞羅瓦紐西蘭有豐富自然資源，而且照政府

的說法，紐西蘭是世界上享有最多人均再生能源的國家。它有風力、太陽能、湖和河。若地熱也算進去的話，Sovacool 和 Watts 認為 2020 前整個國家的能源都可來自再生資源。

但是能源問題總是和政治和經濟糾結在一起，而新的科技或是自然資源浩劫可能比起社會、文化、制度的因素還要不重要。政治精英和資本家比能源專家、原住民團體，社運者等還要常見，所以構成了再生能源政策的阻礙，被掌權者的偏好於大型集中發電廠所勝過。

社會學研究因此需要去指出那些決策者是誰，根據什麼，以及影響為何。然而矛盾地，社會科學多數時候忽略了能源和基礎設施的議題，不過最近有比較不一樣了，因為能源系統漸漸地也被看成是社會系統。當社會科學開始「轉向基礎設施」，新的知識領域則檢視什麼是基礎設施（運作方式和管理模式），做什麼（自然和文化之間的中介，分散社會和環境利益與傷害，連結在地和全球，提供當代生活基礎。）

重建城市是很困難的，在奧特亞羅瓦紐西蘭的最近上一次重建是在 1931 年的 Napier 之後。在 Christchurch 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因為重建很緩慢，痛苦，問題重重。居民持續地對於政府的重建計畫很沮喪。

但是還有希望。「毛利人對於災難的管理方式對這次地震所做出的回應，以及整個恢復的過程是一個很好的典範，」Christine Kenney 和 Suzanne Phibbs 寫到：「在危機管理的階段，毛利人的風險管理方式是合作、有效的，被 kaupapa（文化價值）所形塑，特別是『aroa nui ki te tangata』（把愛傳給所有的人）。Ōtautahi 的人已經顯示了世界等級的創

意，一種新的「暫時都市主義」，小型的都市發起的重建，像是花園、集會廣場、公園等，這些都改善的都市的生活。」

這些社區創意可以提供給更永續的都市結構一些啟發嗎？當我們開始了一個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去看都市由下而上的重建，我希望我們學到的東西可以提供某種創意的理解，實際的指導，政策的可良，提供給都市計畫去轉型到強韌、透平、平等、包容、永續的電力系統。■

來信寄給 Steve Matthewman
<s.matthewman@auckland.ac.nz>

> 後災難地理的創意運動

Holly Thorpe, University of Waikato,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



Holly Thorpe在新的滑板公園前。

在戰爭和自然災害的脈絡之中，兒童和青年總是被認為是脆弱。然而雖然兒童和青年會暴露在高的肢體、社會、心裡、政治風險中，但是把他們看成是「受害者」或許忽略了他們特殊的能動、創意、機智。

我試圖要去超越上述的「缺陷模型」，從事了一個三年的比較研究，提供在地聲音一個空間，並且以青少年的在戰爭、衝突、災難的生活經驗為優先。我兩個個案中包括了皇家社會馬士登基金計畫，聚焦在青年的非衝突運動的經驗，並以政治不穩定和持續衝突的脈絡為主。第一，Skateistan是一個非政府的滑板學校，給阿富汗的弱勢兒童。第二個是在 Gaza 的草根群體。在其他兩個個暗中，我也研究了行動運動社會、心理、公民重要性，特別是那些住在被自然災害所毀壞的社區，並且也研究復原的階段：我們檢視教會在 2010 和 2011 的地震後變化，以及在 2005 卡翠那颱風後的 New Orleans。

我們對於地震後紐西蘭的 Christchurch 的研究初步結果已經顯示：人們使用多樣且細緻的方法去面對和處理各種權力交織的結構。我們的研究聚焦在運動參與和公民參與。2011 的地震造成了 185 人的死亡，受傷的人則更多，而

且把市中心幾乎剷平，毀壞了幾乎 20 萬的房屋。摧毀重要基礎設施（道路、溝渠、水）的地震也會摧毀運動設施（健身館，體育場，游泳池，俱樂部，體育館等）。這些災後的損毀其實一開始很少人擔心，但是接下來運動習慣的損失在災後幾個月就出現了，居民無法順利重建災後的生活習慣。我考慮了災後運動員和居民的經驗，包括了組織、競爭、休閒的運動，也去研究忠於運動的人從事非競爭，不受管制或是「生活方式」的運動，又這些個體如何在災後從事運動休閒。

在地震後許多參與者馬上把運動視為是次要於健康和家庭與朋友的相處。可是運動後的幾週，許多人承認了對災難對於其運動的損害。像是 Emma 是一位衝浪者，就說：「一旦我把家務做完了，我馬上意識到有一個生活中更大的東西遺失了。」對許多人來說，對於其熟悉的運動空間被毀壞後，可說是也毀壞了運動的習慣。對於滑板者來說，市中心的「紅區」意味著其最喜愛的都市樂園的消失。攀岩者不僅失去了室內的攀岩設施，也失去了在 Port Hills 的攀岩場地，騎單車者也失去了好幾條路徑。對於排水道的損壞也迫使 Christchurch 的市民委員會去把為經過處理的水排到河川，關

閉地方沙灘數個月，中斷了衝浪和沙灘使用者的慣習。

受訪者描述了強烈的物質、情感、心裡層次對於運動習慣中斷的回應，而其他則深深地感嘆運動空間的消失：「我對於失去的那些地方感到相當悲傷，」一位日本攀岩者 Yukimi 說，「我最愛的攀岩運動在那，我的計畫在那，我好想它們。」

文化地理者 Tim Edensor 寫說，個人通常藉著「恢復家庭空間，習慣，時間」去試著要去最小化主要的損害影響，這對於許多生活風格運動的參與者來說的確如此，許多人尋求熟悉的運動身體的韻律還有生活風格，試圖去處理壓力，去重建個人和集體的認同，以及去強化新的歸屬感，許多攀岩者組織了集體攀岩場地旅行，某些路徑成了 Allison Williams 所謂的「療傷地景」。

對於某些 Christchurch 的居民來說，運動參與也幫主逃離了（若只是暫時的）日常生活的壓力。例如 Aaron 是一位熱衷衝浪的人，描述衝浪是如何對於與朋友社交的重要性：「這裡有衝浪的社群，所以你會想要休息安靜一下，找個地方靜一靜幾天。」

一些 Christchurch 的年輕人也重新使用了地震空間，顯示了創意的對於災難的回應。其擁抱了自己做的文化，反威權性格，滑板者開創了室內的滑板公園，就在一處受損的建築裡面。Trent 描述了如何挪用受損建築作為「像那些鄙視我們並且認為滑板沒什麼好處的人，說再見」。他們不「坐在一起哀怨災難帶來的傷害，我們是真正做了些什麼事情，並且說『嘿看看我們用這些損壞的東西做了些什麼事情。』」透過創意的回應災難空間，他們重新定義了對於地的解讀和詮釋，不認為地震後一定是死亡、損壞、和殘骸。

地震之後，另類的運動也提供了機會去重新定義物質和情緒的災難地理，重新建立了社會網絡和連結。但是這樣的行動運動的努力也可以是去包括剝削和商業化的面向的。2015 年美國的 Levi Strauss 宣會去投資 18 萬紐西蘭幣去建造一個滑板公園。多數的地方上的青年和父母們強烈地偏好 Levi 所支持的滑板公園。他們不批判跨國企業的投資，反而歡迎。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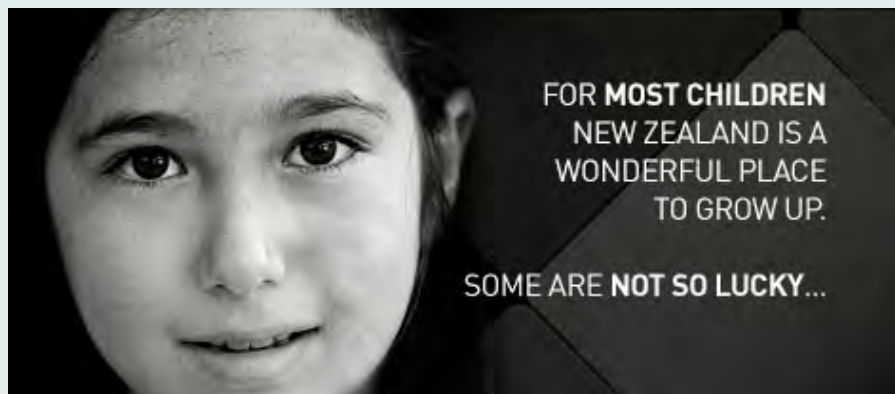
有些地方居民用網路市民委員會論壇表達了對於 Levi Strauss 投資後災難 Christchurch 的經濟考量的擔憂，以及市民委員會的默許的憂心。評語像是「我們需要用有想像力的方式去極大化我們的環境利益，而不僅僅考量廣告收益」，「Levi 是一個跨國公司，尋求對公司最大的好處，不會關心我們的社區」等，這些都顯示了居民是擔心 Naomi Klein 所謂的「災難資本主義」，其中跨國資本企業看到了災難後的市場商機，加上市政府缺少資金去補助運動和休閒娛樂設施。

我們進行中的研究或許是第一個對於非正式運動所提供的機會去改善戰爭或是災難處境的全球研究，也是地一個去看不同權力型式的研究。我們發現了有想像力的青年如何回應了地方的處境，同時也被全球權力更跨國網絡所影響。■

來信寄給 Holly Thorpe
<thorpe@waikato.ac.nz>

> 無聲無息的虐待

Elizabeth Stanley,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



紐西蘭組織「Child Matters」：教導如何防止虐待兒童。

在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之後，紐西蘭的移民網站受到許多想要離開他們家園的人的注意。紐西蘭肯定是有吸引力的：拍電影的喜歡捕捉我們壯觀的風景，而這個國家是一個充滿牛奶和蜂蜜的土地，我們被認為是好客，進步，人權的國家：紐西蘭的女性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投票權的國（1893），在二戰後，紐西蘭人Kiwis對於發展國際的人權這點上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而且紐西蘭的修復式正義也是很有名的。

但是，若仔細點看，紐西蘭其實沒有看起來的那麼進步。貧窮增生，性侵害比例很高，而且在新自由主義的賣落下，毛利人有著不成比例的高坐牢率。所以移民所看到的表面光鮮亮麗其實是包裝著排他、邊緣化、罪行化的政治與政策。

沒有什麼比紐西蘭政府對於兒童虐待的回應還要可以說明這點了。最近幾年來，數以千計的紐西蘭人勇敢地站出來作證虐待的罪行。我的書《The Road to Hell》中，105個受害著描述了如何在國家的照顧機構和福利政策的居住地區所發生的事情，而那也只是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十多萬待過這些地方的兒童的一部分。

這些證詞是很冷酷的。社工通常把兄弟姊妹分開，有時候分開到幾百英哩遠，或是把兒童放到黑暗隔離的安全房間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月，有時甚至電極來處罰那些要逃跑得兒童。小孩若是抱怨性侵害的發生，就會被要求不能講。居住設施也很有限，沒有教育設施，然後那些惡霸小孩會被告知要去控制其他人。社工還會告訴小孩說沒有人愛她們，體罰到小孩流血，或是用牙刷刷地板。他們把小孩當作犯

人，不尊重相對進步的政策法規，反而用恐懼去讓兒童更加受傷。

許多年後，受害者開始去揭露過去以及國家如何傷害或是失敗地去保護他們。若把這些畫成表個，從憂鬱正到後創商症候群，糾率、吸毒、家庭暴力、坐牢等，而受難者也站出來，希望其生命經驗可以被承認，理解，回應。

然而，紐西蘭政府卻反其道而行。當許多其他國家像是澳洲、加拿大、國、愛爾蘭等國都會給的，像是公共肯認、個人支持等，這些回應提供了一種管理真相訴說的制度，興趣和金錢以及後果我們都要看看。

多數的虐待已經開始尋求補償了，這是透過社會發展部門的「歷史訴訟單元」。不幸地，社發部也是那些反對這種答案的一員。一個受難者Peter說「若是我們沒有完成那些事情，他們才不會給你滿意的答案。」

的確，許多受害者遭遇到了一種不相信和詆毀的文化，這些都發生在社發部，而很多年來也無法去調查那些虐待案件，總是不合理的預設所有的受難著都已經被政府部門所紀錄。受害著也被告知說因為其沒有任何可以佐證虐待的檔案，所以訴訟無效。

社發部也譴責受害者，認為問題是受害者自己造成的，傷害不是從虐待而來，而是從生命經驗而來。Sue就是一個例子，她被通知其宣稱並不具有效力，社發部認為其問題是來自酗酒，而那是Sue早期生命就開始的經驗。政府也拒絕承認任何其酗酒和她所經歷的暴力、性侵害、輟學等之間的連結。

最近幾年，社發部使用了一種「快速通過」的方式讓700多件的案件和解了。受難著

通常對於一封短短的道歉性非常感激，因為那是

然而，為了接收總和，受害著要放棄其興起訴訟的權利，而且那些達成和解可以領取賠償的人還會被社發部威脅要取消其社會福利。

然而也有另外兩個補償的替代途徑。第一，受害者可以打官司，雖然國家仍然依賴法律技術去降低訴訟。在消滅時效下，受害者被告知其訴訟已經過了追訴期限。此外，政府也可能在知道自己不會勝訴之後取消受害者的法律協助。

第二，在2008年到2015年，受害者可以向保密傾聽協助支援服務機構述說其經驗，並且收到有限度的幫助，有十個諮詢機構可以幫助找紀錄和親屬等等之類。然而，就像該服務的名稱一樣，都是保密的。如Sue說的：「我們沒有西敏寺系統(Westminster)，我們有的是擺脫西敏寺的系統(Axminster)」¹，該系統讓對於暴力虐待的噤聲更加合理化。

若把國家這些罪行的歷史藏起來，那麼這對受害著來說一點也沒有幫助，並且傷害仍然持續之中。紐西蘭國家對於兒童的虐待是可恥的，這從學校的安全房間，長期的監獄封鎖，不合理的對待在兒童青年家庭的居民，或是許多的中途之家，都是如此。若對於過往噤聲，那只是對繼續合理化對於那些傷害的社會、文化、制度的默許而已。

其他國家提供了例子說明了有更適當的取徑：公開地訴說困難的故事，承認國家的角色，找出在虐待和長期傷害之間的連結，提供支持，獨立的補償方式，以及公開道歉。作為道德修補的一個必要形式，有罪的國家若願意去負起責任，去承認犯下的罪行與暴力，這麼做是可以幫助無數的身心受創、飽受煎熬、害怕無助的受難者走出傷痛。官方的承認，透過「承認、修補、防治委員會」，將可以讓受害著接受過去，並且這應該是國家首要任務。■

註1：「Axminster」是對「Ax」一字的混搭和挪用，而該字的意思是「擺脫」(get rid of)。

來信寄給Elizabeth Stanley
<elizabeth.stanley@vuw.ac.nz>

> 社運與學術

Dylan Taylor,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



Malcolm X的一段化激勵了左派智庫 奧特亞羅瓦經濟和社會研究。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的代議政治處在休眠狀態，其第五民族政府持續執行新自由主義計畫，而這計畫是 1984 年第四勞動政府所開啟的，其推動減稅，私有化，偏向雇主的勞動法案。結果可預期的是：不平等的深化，無殼蝸牛的增加，危險勞動的上升。

工黨和綠黨透過 2017 年選舉的備忘錄而連結在一起，公開承諾若今天贏得選舉會負起「預算責任」。就像許多其他的發展民主一樣，奧特亞羅瓦紐西蘭已經看到的投票率下降的趨勢，升高的政治冷漠傾向，這趨勢看起來工黨和綠黨也很難翻轉。

然而代議政治之外也有創意的計畫試圖挑戰新自由主義。社會學家和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在重新活化希望和批判的文化，以及開創反霸權制度這兩點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這些有著光明前景的發展包括了激進左翼智庫的建立：奧特亞羅瓦經濟與政治研究 (ESRA)。《Counterfutures: Left thought & practice Aotearoa》(反向未來：奧特亞羅瓦左翼思想和實踐)；舉辦年度會議：社會運動、抵抗、社會變遷 (SMRSC) 會議，這三個都堅定地要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現狀。

ESRA 在 2016 年開始，從 Sue Bradford 的博士論文展開，其研究了左翼智庫在奧特亞羅

瓦紐西蘭的可行性。Bradford 長期投入社運，為貧窮團體發聲，並是前綠黨立法委員，吸引了學術和運動者去種下了一顆種子：「反抗的文化，團結和希望，透過轉譯剝削、壓迫、邊緣化的希望和議題」(<https://esra.nz/about/>)。早期的計畫包括了研究住宅危機，重新思考經濟計畫，討論新的政治組織模式。

ESRA 的目標 (kaupapa，毛利與的「綱領」或是「目標」) 是很堅定地要去肯認毛利民族主權的。(這其實是這個國家的建國文件所保證的：懷唐伊條約，但是還沒有任何的政府公開表彰過)。該提議試圖去研究可以去超越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策略方法，並且指導原則是知識的洞見和有效性是由上而下的，這對社會科學來說越來越重要，而這樣的知識對於思考另類替代的社會組織模式是很根本的。

類似的提議也帶動了新的出版：Counterfutures。該期刊目標是「去騎和啟動關於如何去理解、想像、影響我們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的辯論。」其試圖去開啟一個在學術研究者和社區團體、工會、社運知識生產者之間的對話。除了作為同儕審查的期刊，Counterfutures 也發表「介入」當代政治社會議題的文章，以及訪談社運者和學者的文章。該期刊在獨立書店和大學圖書館都可以找到，並且在免費把

6 個月內出版的文章上網，這是為了確保不被付費機制所限制。而多元的讀者群也證明了讀者是喜歡由社會研究和新的政治組織機會研究這樣的另類思考文章的。

《Counterfutures》的前三期包括了從不同背景而來的作者，像是 LGBTQI+ 團體，社會學，毛利社運者，心理學，監獄廢除倡議者，哲學，反貧窮運動，歷史，工會，犯罪學，環境團體，傳播研究。這些不但跨過了社運和學術的二分，也是跨學科的。

在年度的 SMRSC 會議也是明顯有同樣的氛圍。該會議由 2014 年的土耳其學者 Ozan Nadir Alakavuklar 所舉辦，規模一直成長中。第三屆吸引了超過 400 人參加，被認為是奧特亞羅瓦紐西蘭的極左會議派的指標性事件，這也是從 1970 年代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多不同背景的人一起聚集在一起。會議包括了毛利人主權，另類經濟模式，太平洋島族群社運，工作的未來，氣候正義，健康與殘障正義，當代工會等。重要的是，參與者包括了運動和學術背景的都 (<http://counterfutures.nz/2/editorial.pdf>)。

SMRSC 的參加者和組織者已經面對遭遇過了從多元性而來的緊張，這是有建設性的，而非輕視或是繞過它。2015 年的時候，SMRSC 會議公開了運動和學術取徑之知識生產模式之間的緊張，這也因此有了 2016 年大會的主題：「運動和學術的分野」。所以該年的大會聚焦在左翼毛利人和白人 (Pākehā，歐洲裔奧特亞羅瓦紐西蘭人) 之間的緊張；2017 年的主題則是 Ka whawhai tonu mātou，超越資本主義—超越殖民 (<https://esra.nz/socialmovements2017/>)。

這就是審慎樂觀主義的導致因素，而儘管惡化的不平等和代議政治的脫勾，仍是如此。首先，行動者的多元代表了一個重新聚焦和超出代議的左派。像是許多已發展國家，奧特亞羅瓦紐西蘭見證了左派的分裂，其分裂是在注重分配的陣營和注重認同的陣營之間開始的。雖然這個分裂持續者，新的計畫說明了分配和認同並不是不同的領域，而有效的社運要同時考慮這兩者。

第二，這些計畫展示了對於一個觀念的強烈信念，就是社運生產的知識也包括要去確定其知識是對合作和研究者有用的。原住民學者 Linda Tuhiwai Smith 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下是很重要的，伴隨公共社會學和成長的社運知識。結合從具體的社會鬥爭經驗而來的知識以及學術知識，一個新的知識生產場域形成了。

最後，不同行動者之間的合作，以及其生產的知識的廣泛程度，這都構成了反霸權計畫的基礎。這個計畫勇敢地去問我們如何可能用不同的方式組織社會。這個問題包括了重新活化平等得概念，尋求新的政治和經濟組織的形式，解殖民，以及開啟更永續的環境。這個計畫才剛起步，而且很脆弱，但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顯示了若是不去考慮替代方案，那資本企業就永遠長相左右。這樣的計畫在奧特亞羅瓦紐西蘭因為社運和學術的合作而是有光明的前景的。■

來信寄給 Dylan Taylor
<Dylan.Taylor@vuw.ac.nz>

> 邁向原住民 犯罪學

Robert Webb,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奧特亞羅瓦紐西蘭

毛利民族對於過去的驕傲象徵是祖先看著其後代子民的困難處境。Arbu使用Freepik的圖繪製。



在奧特亞羅瓦，毛利民族是相當社會邊緣化的，這在犯罪和受害的機率上是不成比例的高的。這和英國其他殖民地的原住民族所經歷到的是相同的。毛利民族只佔總人口的 15%，但是卻比起其他族群更可能被逮捕、定罪、服刑。儘管紐西蘭有著名的修復式正義制度，並且就是以毛利民族的傳統為基礎的，毛利人的定罪率害是相對很高的，這對毛利人相當不公平，因為毛利男性佔了全國男性罪犯的 5%，女性則是 60%。儘管大家廣泛承認了這個體系的失敗，並無法降低犯罪率，還造成受刑人的小孩和家庭必須經歷社會排斥，但是最近有研究指出，受刑人數目還是會繼續增加。

針對毛利民族的刑事介入已經從過去殖民時期到現在被從不同的方面被理性化了。在這

個國家歷史的不同期間，立法者和政府官員都是圖去解釋毛利人的犯罪行為，想要說那是毛利社群的傳統和結構下不證自明的社會問題。

數十年來，毛利民族也挑戰了紐西蘭國家政策的制度性種族主義。Moana Jackson (1988) 的書 *The Māori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 He Whaipa ā nga Hou* 從毛利的觀點研究了刑事體制。這個分析描述了影響了毛利人生活的社會和歷史過程，包括了殖民和強加的司法體系。這份報告批判了檢視了紐西蘭的刑事制度，指出了這樣的實踐和方法背後的文化價值。

當然，國家也曾試圖去改革司法，反應多元價值，以及處理毛利民族的議題。譬如 1989 年的青少年司法體系引入了 1989 兒童、青年、家庭法案 (CYPFA)，這透過把犯罪者和受害者

的家庭帶入一起開會的機制去讓青少年犯罪可以減少。這樣的機制被認為是來自於毛利的哲學，強調集體責任和社會關係。但是，毛利人的青少年(10-16歲)犯罪比例還是增加之中，佔了62%的青少年起訴案件。

有些研究者指出這樣的雙方家庭開會機制沒有改變國家司法的根本哲學，反而國家權力繼續施加社會控制。Juan Tauri說家庭成員開會不是一個毛利的傳統，只有部份毛利人這樣做。他認為CYPFA本身被Jackson的司法中的種族中心主義的批判所影響，而該過程納入了毛利人的元素是因為毛利組織的建議。然而他也說，雖然毛利傳統有些已經納入官方制度中了，家庭團體開會的機制不是毛利民族的傳統。

發展有意義的分析和批判已經是社會科學學術中的毛利民族的關懷了，這需要檢視我們如何研究毛利族群的社會情境。我們許多人都支持原民的發展，就是Linda Smith的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就影響了毛利人許多，也影響了其他學者去研究那些正視原住民經驗和知識的理論與方法。同樣地，我們許多人希望可以發展一個批判的原住民犯罪學，可以肯認毛利民族的經驗以及其對於犯錯與社會傷害的概念。

若要超越國家對於犯罪偵防的官方回應，像是擴建監獄，那麼就必須回應和考慮毛利人的社會現實。類似地也需要社會理論家去和原住民交流去形成一個解放的研究綱領。為了建立一個原住民犯罪學，必須要關注加害行為的各種相關元素，還有社會傷害的集體經驗。也必須去檢視國家和刑事體制在社會邊緣化和原住民受刑人的大量比例的現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原住民犯罪學也要試圖去納入那些受到影響的人的經驗，超越官方的犯罪控制架構，超越國家定義的議題範圍。

新的取徑應該更加關注殖民性、制度性種族主義、系統暴力如何控制和邊緣化原住民。毛利學者像是Tracey McIntosh和Khylee Quince的研究已經指出關注毛利女性受刑人和與代間受刑與受害有關的社會問題的重要性。

原住民犯罪學必須要和毛利的經驗互動，

包括分析社會有害的犯和相關的社會結構條件。基本上，這也可包括研究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研究國家和其他掌權團體對於毛利民族的傷害。在解殖民的方向上，目標就是培力毛利社群，增加對司法體系的權力，並且從毛利的價值觀出發。■

來信寄給 Robert Webb
<robert.webb@auckland.ac.nz>

> 醉心於休閒研究



Ishwar Modi.

那是 5 月 23 日星期二的早晨，在印度的 Ahmedabad，我收到了 B.K. Nagla 的電話，被告知 Ishwar Modi 教授過世的不幸消息。他享年 76 歲。有些人並不會因為過世而消逝，包括了想法、記憶、情感等都會永遠存在。Modi 教授就是屬於這種人。全球社會學和印度社會學都會記住 2017 年有兩位社會學家過世，一位是 D.N. Dhanagre 教授，另外一位就是 Ishwar Modi 教授。

Modi 教授於印度位於 Jaipur 的 University of Rajasthan 社會學系開始其學涯的，那時是 1974 年，我則晚了兩年任職。從一開始 Modi 教授就是社會科學裡面最受教師和學生歡迎的人之一。他師從 Yogendra Singh 教授，於休閒研究領域獲得博士學位。其學涯有許多成就，他是印度社會學會的會長，就是 Rajasthan 社會學會的會長。於 1986 年開始了國際社會學的生涯，因為那年的 ISA 世界大會在 Delhi 舉辦。他帶動了許多師生去參加世界大會和其他的國際會議，並鼓勵年輕學者加入 ISA。

Modi 教授深深地獻身於把全球社會學知識帶到印地語社會學之中。他有策略地編輯 ISA 的雜誌《全球對話》，因為這是任務也是挑戰。他和團隊總是平等也民主的合作。因為我不是個有紀律的人，許多次印地語的《全球對話》都拖稿了，但是他總是謝謝我。他也很感謝其他編輯，包括了 Rashmi Jain 博士，Jyoti Sidana 博士，Prabha Sharma 博士，Dr. Nidhi Bansal 博士，和

>>

Uday Singh 博士。另外他也大大貢獻給了印度社會學會出版的期刊，這是一份有水準的定期出版期刊。所有這些 Modi 教授的貢獻都對印度的社會學師生來說影響極大。儘管他過世了，我希望一切都會進行下去，包括印地語的《全球對話》也會繼續出版下去。

因為有這多種興趣，Modi 教授貢獻於許多領域，包括了兒童福利、青年社會運動、性別正義、勞動階級、邊緣族群。在他廣泛的於印度和世界各地旅行的期間，他用社會學的語言去關心健康、貧窮、生態、人口、社會運動、投票行為、人權等議題。除了其專攻的休閒、觀光、媒體等領域，Modi 教授也對社會理論有所貢獻。於 ISA 期間的貢獻特別會被 RC13 的成員所記住。此外，他也到世界上幾乎各個國家去從事學術活動，且著述等身，其對於教師運動等的投入也讓

他成為了一名知識分子和批判社會學家。

Modi 教授的仁愛也會被永遠記住。他和他的家庭用愛、關心、尊重對待每一位客人，就像在休閒時輕鬆自如自己的家人一樣。

Modi 教授的過世對於其家人和朋友來說是個損失。社會學失去了他，但是其精神長存。再見了，Modi 教授，社會學界會很想念你的，你也會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裡面。■

Rajiv Gupta，印度社會科學會會長

> 鼓舞啟發人 心的源頭



Ishwar Modi在家鄉Jaipur。

Ishwar Modi 教授於 2017 年 5 月過世了。他和癌症抗戰了很久。生病期間他仍然繼續支持並指導印度社會學家，培育新生代的休閒社會學者。他的過世是印度社會學、休閒社會學、整個學術界的損失。

Ishwar 加入 RC13 (休閒社會學) 的時候就已經是該領域的著名學者了。他被鼓勵去擔任 RC13 的會長，度過變遷的年代。他充滿了活力和知識，

去吸引了許多人的加入。擔任過好己任的會長的 Ishwar 執行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計畫，寫了許多專書和編輯了許多書籍，最後一本編輯的書是 Leisure, Health and Well-Being，在今年 4 月出版，與兩位其他 RC13 的會員合編。擔任 RC13 的會長的時候 Ishwar 也是 ISA 執行委員。

在 RC13 和 ISA 之外，Ishwar 與兩個平行的發展相當

>>

投入。他被選為世界休閒娛樂協會（現在稱為世界休閒，World Leisure）的理事，這是國際休閒專業的最大組織。此外，他也被該組織所尊重，授予終身榮譽會員。第二個發展是其參與印度社會學會，在2015年得到了終身榮譽獎，感謝其推動印度社會學，並且貢獻於世界級一流的研究與教學之中。

當他過世的消息傳到 RC13 的時候，悲傷的情緒多少被會員間彼此分享的回憶和感恩沖淡了些。每個人都有個可以訴說與 Ishwar 有關的故事，而且都是一段長久關係與友誼的故事。從 RC13 最年長到最年輕

的會員都有此感覺。Ishwar 是我們的前會長，是我們的導師，也是我們的老師，致力讓我們感覺到受歡迎。Ishwar 讓我們的決策、ISA 會議、期中會議等有了包容的基調，我個人很珍惜他在 RC13 的時光，也總是對他的鼓勵感到感激不盡。我第一次在匈牙利遇見他，那是一次 RC 的其中會議，在那之前我們用電子郵件通信過了。我想我就和其他的會員一樣，很傷心並不能再見到他了。但同時，我想我們也都很高興 Ishwar Modi 的精神已經永遠與我們同在。■

Karl Spracklen, Leeds Metropoli-

tan University, 英國, ISA 休閒社會學研究委員會副會長與執行秘書 (RC13)

> 介紹土耳其編輯團隊

Gül Çorbacıoğlu 和 İrmak Evren,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土耳其

我們的團隊在 2015 年 1 月加入了《全球對話》的編輯陣容。我們主要是由兩位位於土耳其 Ankara 的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所組成，他們分別是 Gül Çorbacıoğlu 和 İrmak Evren，另外，Ahmet Seyhan Totan 這位好友也幫助編輯和設計的部分。

可以和最新世界上的社會學辯論跟上腳步，然後翻譯成土耳其文，這令人相當雀躍，但也相當有挑戰性。這份工作不僅僅是翻譯而已，我們必須要把英文版的 Global Dialogue 翻譯成土耳其文的 Küresel Diyalog，要確保整份刊物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整個過程從收到英文版的文章開始，然後，首先我們先分配文章，把類似主題的文章歸類，或是關於相同國家的文章分成一類，也按照我們個人的興趣去考量，以求可以最大化個人的投入努力。然後我們必須努力在截稿日之前完成。作為兩個人的團隊，是需要許多的毅力和責任感的！

一旦我們完成翻譯之後，我們會交換然後校對。我們相信第二次的校對，也就是作為一的讀者而非翻譯者，可以從一個觀眾—社會學者或是對社會學有興趣的人的觀點去看，當我們發現有不好翻譯的字詞時，又深怕直譯會

不夠到到位，我們會查詢土耳其的相關文獻，或是跟我們的教授請益，看看是否這個詞已經有翻過，沒有的話又該如何翻譯。當可行的時候，我們會用土耳其的俗語讓文章更生動傳神。而最後翻完，包括圖片解釋之後，我們會把稿子給 Seyhan，她是版面編輯的專家。編輯完稿後，我們做最後確認。最後，我們驕傲地產生了新的一期的 Küresel Diyalog!

一旦 ISA 的網站刊登之後，我們就會把這消息傳散出去，給我們大學裡的同事和對全球社會學有興趣的團體。翻譯《全球對話》的土耳其版讓我們接觸到新的議題和社會。並且每一期我們都和高興地和土耳其的社會學社群一起分享我們的興奮和熱情。■



İrmak Evren 從 Istanbul 的 Bilgi University 得到經濟和管理學士，然後從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也取得學士。她然後在法國的 Université Paris 1 – Panthéon Sorbonne 工讀經濟學研究所，以及 Istanbul 的 Galatasaray University 攻讀媒體傳播研究所。現在則是在土耳其 Ankara 的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攻讀社會學博士。其研究恐伊斯蘭現象和於法國的跨國土耳其穆斯林的宗教組織，她也是 Istanbul 的 Okan University 的電影學系的講師。



Gül Çorbacıoğlu 從 Istanbul 的 Bilkent University 取得國際關係學士，以及 Ankara 的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取得社會學碩士，現在於同一所大學就讀社會學博士班。其論文是有關土耳其醫療專業自主性的轉型，部份研究是在英國的 University of York 擔任訪問研究員所進行的。目前她也是 Bilkent University 的政治與公共行政系的講師。其興趣的領域是醫療社會學，專業知識社會學，工作與組織社會學，性別研究。

來信寄給 Gül Çorbacıoğlu <gulcorbacioglu@gmail.com>
İrmak Evren <irmakevrenn@gmail.com>